

## 胡耀邦的民主思想

● 何家棟、王思睿

胡耀邦的民主作風盡人皆知。如果沒有民主思想作為支撐，一個人的民主作風可能是被迫的，或是偽裝出來的，一旦權力增加了、穩固了，就會打回原形，暴露出專制、獨裁的真面目。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不乏其例。但是，胡耀邦的民主作風的確是源於他一以貫之的民主思想。他平易近人，沒有官僚架子；平等待人，歡迎別人講話，喜歡與人討論問題，甚至能與晚輩促膝談心。1979年他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時候，就曾在自己家中與青年人一起探討時局。有的人說他「到處亂跑，隨便亂講，不像個領袖」，佩服他的人稱他為新型的「平民政治家」。

胡耀邦認為，沒有民主，社會主義就要蛻化變質，「從人民的公僕變為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變為壓迫人民的統治者。」他說，這種事「歷史上是有的嘛。意大利那個墨索里尼，開始是主張社會主義的，以後卻變成了法西斯主義的頭子」。為甚麼會發生這種變化？因為「黨從被壓迫、被屠殺、被圍剿的地位，轉到了執政黨的地位這個根本的變化」。胡耀邦探討根源說：

執政以前，形勢迫使我们黨要有一個好的作風，搞甚麼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脫離群眾，搞特權，就會被敵人打垮、消滅。而且環境本身就很艱苦，沒有多少特權可以搞，也不能像我們現在這樣搞那麼嚴重的官僚主義，一個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尤其是在戰爭年代裏，敵人來了，打不打，走不走？考慮考慮吧，研究研究吧，畫畫圈吧，那樣幾個小時後，你不是被俘就是嗚呼哀哉。

所以到了執政以後，如果官員們以為可以用強迫命令來迫使人民群眾就範、服從，而無須用說服、教育來吸引人民群眾，執政黨就會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成為一個官僚特權階層。

好學善思，是耀邦同志的一種生活樂趣。據他的秘書高勇等人回憶，他讀書的範圍很寬，從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到四書五經、《資治通鑑》，從中外古今名著到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希特勒、蘇加諾以至尼赫魯的書，還有一些科學技術知識的小冊子，都在他的閱讀之列。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就通讀過兩遍。胡耀邦算過一筆賬：

胡耀邦經常走訪少數民族聚居地視察民情。



要讀馬、恩、列、斯的全集，要讀四書五經，要讀完古今的文學名著，要讀完二十四史。這些書一共有五千萬字，即使一個人一天能讀一萬字，要讀完這些書，至少也得要十四年。二十多歲的幹部按照這個方向去努力，到了四十歲左右，可以成為一個學者了。

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他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吸取營養的。當年，馬克思所設想的現代社會不是由特權來統治的社會，「而是廢除了特權和消滅了特權的社會，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權束縛的生活要素獲得自由活動場所」的公民社會、法治社會。馬克思說過：「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以便「馬上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餘」。這個「革命專政」只是「臨時性」的，不是指整個社會主義過渡階段，「臨時性」有確定的時限。最後期限馬克思也指出來了，就是新的階級關係已趨穩定，能夠制定和通過憲法的時候。憲法的頒布，標誌着革命狂飆時代的結束。如果要「繼續革命」，就意味着停止憲法保證，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馬克思認為

在現代社會，「不掩蓋社會矛盾，不用強制的因而是人為的辦法從表面上制止社會矛盾的國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國家形式，能使這些矛盾進行公平鬥爭，從而獲得解決的國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國家形式。」

比胡耀邦老一輩的領導人，就沒有像他那樣充沛的精力來學習和思考了，鄧小平在胡耀邦下台後，也曾肯定過胡的歷史功績和沒有私心，但認為胡的缺點就是對自由化重視不夠，有點右。

其實，恩格斯早就說過，共產主義就是人類在甚麼條件下才能獲得自由解放的學說，也可以說自由才是人的終極目的，又何罪之有？只有封建農奴主才把它當作不祥之物。胡耀邦是中共領導人中講民主和自由最多的人。在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大第五屆第二次會議的小組會上，胡耀邦曾經很激動地說：

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不點名也

好，批評我背着中央搞違犯「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堅持認為我那樣做是從大局着眼想的，即使多數人反對，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

無產階級的政黨本應高舉自由民主的旗幟，如果在黨內高層，只有一兩個人大講特講自由民主，而且講過之後命運還都不佳，這的確是很不正常的現象。

1979年10月，中國文聯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後，胡耀邦就文化藝術工作講過一些話。他不但重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且在中共執政的歷史上首次提出執政黨應該尊重創作自由的主張。他提出：黨非但不應該干預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反而應該尊重知識份子及其精神勞動的獨特性，保證創作自由和學術自由。他特別強調「意識形態的問題，一定要經過商量、討論，逐步求得一致，加以解決，不能採取隨便下指示的辦法」。在實踐中貫徹得如何，就要看宣傳理論的幹部是否有良好素質，所以他提議：「從宣傳部長起，都來一次開卷考試，考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不得請秘書代勞。」這個意見至今仍有現實意義。因為一些從來不讀馬列的長官，除喜歡自稱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外，還最喜歡叫別人學習馬列。

在胡耀邦主持下，80年代的一些中共中央文件中都寫進了民主化的目標。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報告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

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中寫道：

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資產階級的這些觀念，又同它們有原則的區別。從根本上說，資產階級民主是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社會主義在消滅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基礎上，為充分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把民主推向新的歷史高度開闢了道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調民主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近來中央着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在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上，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以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把民主和自由視為全人類的精神遺產，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並將其寫入執政黨的正式文件中，這是胡耀邦對於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大貢獻。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

通過決議前的幾年中，胡耀邦曾一再表達過這一思想。1984年，他的長子胡德平作為中共中央整黨領導小組特派員在湖北省工作期間，積極支持一批思想敏銳的青年學者創辦了《青年論壇》，胡德平本人在創刊號上發表了〈為自由鳴炮〉的文章，為自由正名，強調自由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價值。這篇文章中的觀點應當說是代表了胡耀邦的思想。

在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前不久的一次會議上，他說：

我們在討論明年黨的十三大指導方針時，一定要順從潮流，順從民心。在本世紀初中國結束封建專制以後，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世界各國流行的理論和思潮都在中國提倡和實踐過。中國人民最後選擇了民主和科學作為最高社會價值和目標。這是在長期專制和落後壓抑困擾下的中國人民的最後選擇。四十年建設，十年動亂，又加上了一條法制。這些已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

1985年7月，根據胡耀邦的提議，由思想解放的原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接任中宣部長。一年後，朱厚澤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寬」政策——對不同意見和看法要寬容一點；對不同意見者要寬厚一點；要努力使空氣和環境寬鬆一點。顯然，「三寬」政策是徵得胡耀邦的同意，也反映了胡耀邦的思想。

胡耀邦說：「民主應當成為人民群眾自我教育的方法。」人民總是從他們的領導者那裏學習政治——從殘暴者學到殘暴，從寬容者學到寬容，迫害必然導致反抗，屠殺肯定招來復仇。現在社會上出現的各利益群體之間的摩擦，問題只有在妥善平衡各方

面利益的情況下才能解決，所以，容忍和退讓妥協，就成為求得共識的必要手段。可以說胡耀邦從他下台前到下台後，寬容是他一貫的政治態度。用他的說法，就是「不要使自己負激化矛盾的責任」，因為「採取激化的辦法，就往往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所以他主張，「當着人民內部矛盾被錯誤地處理，走向激化時，我們千萬要冷靜，不要跟着起鬨，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識地『鈍化』一下，實行『冷處理』。」有些地方官員出於卑鄙自私的目的，無視這些忠告，往往謊報軍情，遇到突發事件，不思息事寧人，反而火上澆油，把群眾一切的正當訴求都作為「不安定因素」，「立刻消滅在萌芽狀態」，好向上級邀功請賞。他們連舊王朝官僚「保境安民」那點觀念都沒有，不把問題鬧得不可收拾不罷手。眼下看來，這些刁官正是和諧社會的攔路虎。

反對胡耀邦的人把「容忍」稱為「縱容」，批評他「對於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積極份子，一貫採取縱容保護政策」。胡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說：我們的理論宣傳隊伍，在這兩年中也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支隊伍在戰鬥中前進，進步是很大的。特別令人高興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偉大鬥爭中，湧現了一大批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善於思考問題，敢於發表創見的闖將。應當看到，這兩年的思想理論戰線並不平靜，有過那麼幾次風浪。這些同志在鬥爭中衝鋒在前，不愧為思想理論戰線的前衛戰士。他們敢於實事求是，破除迷信，頂住種種非難和指責，不怕飛來的帽子和棍子。他們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說敢幹敢闖。這種無所畏懼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是非常

可貴的。這一批優秀闖將的出現，增強了我們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的力量，是一個了不起的收穫。我們要認真地培養、提高他們，使他們在理論宣傳戰線發揮更大的作用。要從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從小生產的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官僚主義的「管、卡、壓」下面解放出來，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充分地發揚理論民主，堅定地實行理論工作的群眾路線，徹底地肅清林彪、「四人幫」的理論專制主義、理論惡霸作風的流毒，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園地百花盛開。不管怎麼樣，有三條一定要堅持。一是不要隨便抓人；二是不要隨便點名批判；三是不要亂打棍子。這就是所謂「縱容保護」的一個證據吧。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實行憲政民主的首要措施。胡耀邦在擔任總書記期間，還沒有完全擺脫毛澤東新聞觀的框框，但是他關於「切實保證人民有進行文藝創造和文藝批評的自由」的講話和對新聞工作的理解與支持，已經為左派人士所不滿了。尤其他發現自己做錯了事，就實事求是地改正。1981年，胡耀邦批評南京一位作者，後來發現批評錯了，就打電話給江蘇省委，請省委轉告這位作者，要他放下包袱，輕裝上陣，並在1981年8月思想戰線座談會上公開了這件事。雖然胡適認為，弱勢、少數的一方也應當有容忍和妥協的精神，但妥協作為一種美德，主要應該體現在有權勢者身上。無權勢者向有權勢者妥協，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出於被迫，是一種屈辱。像胡耀邦這樣敢於向下級承認錯誤的，並不多見。

胡耀邦反對「輿論一律」。早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胡耀邦就抵制過汪東興對復刊第一期《中國青年》的

興師問罪，抵制過「凡是派」及其追隨者對《人民日報》的指責。他曾說：

為甚麼我們一些很受尊敬的領導人也常常吃飽了飯沒事幹要節外生枝？對那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世界上本來沒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像真有鬼了。其實，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製造出來的。難道中國真的形成「輿論一律」才叫社會主義？我看不見得。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胡耀邦的民主思想，不僅來自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其他人類先進文化遺產的認真研讀，而且來自他對中國社會實踐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與胡耀邦私交甚篤的晚輩羅炤認為，胡耀邦的思想在1972年初出現了重大轉變：「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我說：『我是不讓權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這些話我是當面聽到的。」他這裏指的是毛澤東。胡耀邦又說：「『文化革命』是個大潮呀，誰也擋不住！參加的人這麼多，這麼火熱，究竟是甚麼力量推動的？這裏面應該是有社會原因、歷史原因的。我們中國有長久的封建傳統，恐怕跟這個有關係。」毛澤東去世後，胡耀邦在1976年12月8日給羅炤的信中說：「多年來，『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所築起的兩道堤壩——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壩，已經被我們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沖決了……」（見《南方周末》，1999年7月16日）專制的堤壩一旦沖決，自由民主就成為不可阻擋的思想潮流。

何家棟 大陸學者  
王思睿 大陸學者